

山東省圖書館館藏

海源閣書目

山東省圖書館編

齊魯書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山東省圖書館館藏海源閣書目／山東省圖書館編．-濟南：齊魯書社，1999.12

(山東省圖書館館藏古籍書目之二)

ISBN 7-5333-0846-8

I. 山… II. 山… III. 私人藏書-圖書目錄-中國-清代 IV. Z842.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1999) 第71415號

山東省圖書館館藏海源閣書目

山東省圖書館 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山東新華印刷廠印刷

850×1168毫米32開本 19.25印張 8插頁 479千字

1999年12月第1版 1999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800

ISBN 7-5333-0846-8

G·68 定價：100圓 (特)200圓



山東省圖書館館藏海源閣書目序

冀淑英

清季後期，海內論藏書之家，咸推“南瞿北楊”，稍後又舉“瞿楊丁陸”，瞿指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楊則聊城楊氏海源閣，丁為錢塘丁氏八千卷樓，陸即湖州陸氏皕宋樓。我國歷史攸久，文化發達，傳世典籍宏富，有浩如烟海之稱，典籍流傳，雖關學術文化發展，及著作者之衆，亦有賴歷代藏書家保全維護之功。歷觀各代著名或無名藏書之士，每節衣縮食多方搜求，愛書如護頭目，以求保存並傳播古代文獻，從而有儲備珍貴資料之寶庫留貽後人，厥功甚偉，至可感念。我國現存私家藏書樓最古者，當推寧波范氏天一閣，迄今已四百餘年。天一閣之保存固由閣主人訂立制度嚴密，防火、防潮、防蟲措施得宜，故能歷久不衰，而世事更迭，神州多故，却亦難逃意外之劫。閣書首次散出乃由乾隆間纂修《四庫全書》時，詔令徵求天下遺書，從閣中藏書提取六百餘種進呈；次則鴉片戰爭時英侵略軍占領寧波，從閣中掠去地理輿圖數十種；再次太平天國義軍入寧波，當地游民乘機盜竊，至民初又有大盜薛某，勾結不法書商，潛入閣中盜去藏書一千餘種。歷盡諸難，閣書損失慘重，猶幸根基深厚，建國以來，已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明末清初，常熟錢謙益絳雲樓藏書，號稱東南之雄，順治庚寅（七年）絳雲樓不戒於火，藏書付之一炬，錢氏自謂此為江左書史圖籍之一劫。晚近陸心源皕宋樓藏書，於陸氏故後僅十餘年，為其子售與日人，盈篋秘笈，掃數東去，今貯日本靜嘉堂。覽故家收藏之聚散，或毀於兵火，或陷於災害，罹於胥篋，乃至後人不能世守，處封建社會中，皆人力無

F572/35

從抗禦之劫難，是以前人每有雲烟過眼之嘆。猶幸我國民間藏書，自有傳統，代代相傳，綿連不絕，有助於今日燦爛豐厚傳統文化之形成。各家藏書又多有書目可稽，以供查核，借以知古籍流傳踪跡，識古今典籍之梗概。

世間固聚散無常，而藏書遭遇之慘酷，莫過於聊城楊氏海源閣。海源閣書為楊以增、紹和父子兩代搜訪所聚，以增道光間官江南河道總督，時汪氏藝芸書舍書散，以增所得實多。乾嘉以來吳中藏書家如黃丕烈士禮居所貯宋元舊刻及得自毛氏汲古閣等諸家秘笈，多入海源閣。紹和同治四年進士，官京師，時適值怡府書散，怡府樂善堂藏書，多得之季滄葦、徐乾學，季徐藏書多由毛氏汲古閣、錢曾述古堂而來，於是清初以來，毛、錢、季、徐以至黃丕烈汪士鍾之精本秘笈皆匯於海源閣，海源閣藏棄之富，名聞宇內。閣書深藏嚴扃，又僻處魯東，當時學人無由得窺奧秘，迨咸豐十一年捻軍起，閣書首遭劫難。楊紹和《楹書隅錄》跋宋本《毛詩》，記述其事云：“辛酉（咸豐十一年）皖寇擾及齊魯之交，烽火亘千里，所過之區，悉成焦土。二月初犯肥城西境，據予華附莊陶南山館者一晝夜，自分珍藏圖籍必已盡付劫灰，及寇退收拾燼餘，幸尚十存五六，而宋元舊槧所焚獨多，且經部尤甚。”閣書再次遭劫在1929年，山東時局不靖，土匪陷聊城，閣書遭劫掠。次年晉軍王冠軍又進駐聊城，盤踞楊宅，閣書乃慘遭蹂躪，是第三次劫難。事定王獻唐先生曾前往勘察，有詳細報告。後寫成《聊城楊氏海源閣藏書之過去現在》，記述當時情景。據獻唐先生所見，其華附莊附近田地，多為楊氏私產，所謂陶南山館即在其地，當年楊氏書籍，多藏於此。聞楊氏家人云，彼處書籍久已移藏家中，並見楊氏後宅三室，藏普通版本卷帙甚繁，可知劫后閣書並未盡毀也。楊氏深懼再有禍亂發生，遂於1930年將劫餘書籍，裝箱運送濟南保存。此項藏書屢經轉折，於1994年由濟南人士辛鑄九、苗蘭亭、張蔚齋等集資300萬元（偽幣）從海源閣第四代楊敬夫處購得，1945年捐贈山東省圖書館，省館

關專室保存。海源珍本雖遭劫掠流散四處，大多或入公庫庋藏，或為私家保有，幸有楊紹和《楹書隅錄》及《海源閣宋元秘本書目》等目錄可資查核，得知大略。

當年楊氏存濟之書，既捐歸省館，初加整理，約計二千二百餘部。與楊保彝《海源閣書目》著錄，大體相合。楊保彝稱此項書籍“版刻較近，鈔胥弗精，為世間經見之書”。王獻唐先生謂“其明清刻本類皆精刊精印，彼之所謂普通版本，今多視為善本”。此言誠為確論。今山東圖書館特藏部同志，群策群力，將省館專藏之海源劫餘群書，編成專目，以供當代學人研究之需，與存世海源舊目相比併，此前人所不敢望者，誠一大盛舉，非惟海源之功臣，其記錄一代文獻之功績，實堪垂久遠。今宇內澄清，國運昌盛，書歸公庫保藏，無慮劫難，足為齊魯增光，前賢護持經營之勞，亦不可忘。余供職北京圖書館，歷年所見海源舊藏多種，於訪書聚書之艱辛，至為感動。今者感省館同志勤業之深，樂觀斯目之成，敢忘譴陋，謹陳蕪辭，藉伸鄙衷。

一九九九年十月

山東省圖書館館藏海源閣書目序

王紹曾

聊城楊氏海源閣始建於清道光二十年(1840)楊以增之手，其子紹和繼之，其孫保彝又繼之。保彝無子，以族子承訓嗣。自以增以迄承訓，楊氏海源閣藏書，歷經四世，綿延幾達九十載。然楊氏藏書，實始於以增父兆煜之厚遺堂，至海源閣而規模始宏。此亦猶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始自瞿鏞父紹基之恬裕齋，至鐵琴銅劍樓而遐邇聞名。楊氏、瞿氏俱五代相承，惟瞿氏閱世近百五六十年，楊氏僅百有餘年耳。我國晚清四大藏書家所謂瞿(鏞)、楊(以增)、丁(丙)、陸(心源)者，即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聊城楊氏海源閣，錢塘丁氏八千卷樓，吳興陸氏皕宋樓。迨陸氏心源既歿(陸氏卒於1894年)，其子樹藩不能守父業，舉其所藏，以十一萬八千圓，盡歸日本岩崎氏靜嘉堂文庫，從此皕宋樓之長編鉅冊，掃地以盡。而錢塘丁氏八千卷樓亦於光緒三十三年(1907)歸於江南圖書館。海內巍然獨存者，惟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與聊城楊氏海源閣，故世有“南瞿北楊”之稱。然“南瞿北楊”，其意不盡在此。江安傅增湘氏嘗謂“吾國近百年來藏書大家，以南瞿北楊稱雄於海內，以其收藏閎富，古書授受源流咸有端緒，若陸氏之皕宋樓，丁氏之八千卷樓，乃新造之邦，殊未足相提並論也。楊氏收書，始於至堂河督，其子協卿太史繼之，其孫鳳阿舍人又繼之。至堂於道光季年在南中所收，多為汪閔源之物，汪氏得之於黃蕘圃，黃氏所得多為清初毛、錢、徐、季諸家所藏。至協卿、鳳阿所收，咸在京師，值咸同間怡府

書散，其時朱子清、潘伯寅、翁叔平爭相購致，而協卿亦頗得精密之本。然怡府所藏，亦自季、徐而來，其流傳之緒，大率如此”。（《藏園羣書題記》附錄二《海源閣藏書紀略》）傅氏所論，可謂深中肯綮。蓋瞿氏之書，大抵亦來自汪氏藝芸書舍。葉昌熾《藏書紀事詩》所謂“藝芸散後歸何處，盡在南瞿與北楊”。潘祖蔭《藝芸書舍宋元本書目跋》亦云：“吾郡嘉慶時黃蕘圃、周香嚴、袁壽階、顧抱冲所謂四藏書家也，後盡歸汪閔源觀察。……咸豐庚申以前，其書已散失，經史佳本往往為楊至堂丈所得。”但葉昌熾在引潘祖蔭跋後加按語云：“汪氏書長編鉅冊，皆歸菰里瞿氏，歸楊氏者畸零也。”此說既前後矛盾，且與事實不符。光緒九年（1883），江標出任山東學政汪鳴鸞幕，獲覩楊氏《海源閣書目》及《楹書隅錄》，光緒十年（1884）復隨汪氏觀書於海源閣，“舉凡藝芸書目之所收，《楹書隅錄》之所記，千牌萬緼，悉得寓目”，此即江刻《海源閣藏書目》之由來。江標以為“大約吾吳舊籍，十居八九，蕘翁之所藏，則又八九中居其七焉”。（見《海源閣藏書目跋》）此說與葉昌熾所加按語，大相徑庭。南瞿北楊之所以並稱於世，其原因在此。南瞿北楊在咸豐間咸遭受兵燹，瞿氏受損於咸豐十年（1860），但因四處分藏，未成大災；楊氏因將宋元校鈔藏於肥城華附莊陶南山館，咸豐十一年（1861）戰火延及肥城，捻軍據陶南山館一晝夜，事後“收拾燼餘，幸尚什存五六，而宋元舊槧，所焚獨多，且經部尤甚”。（見《楹書隅錄》卷一楊紹和宋本《毛詩跋》）此為海源閣第一次遭劫，可見其損失之慘重。

若就南瞿北楊之命運而言，尤頗有所軒輊。南瞿北楊俱五代相承，然瞿氏書直至第四、五代，始終如護頭目，抗日戰爭期間，已移存滬上，完好如初，其第五代主人濟蒼、旭初、鳳起三兄弟，秉其父啓甲之訓，雖擁有藏書數十萬卷，而節衣縮食，不改初衷。鳳起晚年供職上海圖書館，居室僅可容膝，即使出售宋刊一部，即可獲致萬金，鳳起以先世遺藏，不敢傷及毫髮，雖清貧度日，而甘之如飴。建國以後，三兄弟先後三次向國家捐獻，入藏北京圖書館，受

到國家表彰，其捐入常熟市圖書館者尚不計焉。反觀楊氏第五代主人楊承訓，視海源閣珍藏宋元舊本為經商致富之資本，不數年間，揮霍殆盡，而楊氏“四經四史之齋”、“宋存書室”天水舊槧，均已人去樓空。相形之下，豈可以道里計。

然楊承訓之所以出此，自有其客觀原因。民國初年，袁世凱當政，其長子袁克定，即思將海源閣書攫為己有，承訓母王少珊聞訊，遂將海源閣樓上宋元珍本，移置臥室。及承訓既長，在京奉鐵路及北洋政府交通部供職，民國十六年（1927）六月北洋政府解體，繼之而起者，以張作霖為首之安國軍政府，承訓因在天津定居，決定自謀生計。其時山東地方不靖，尤以東昌為甚。承訓乃將部分宋本携往天津。此即當年盛傳之海源閣楊氏後人捆載至天津出售之宋本二十六種。一時社會喧騰，甚囂塵上，國內藏書家咸奔走相告。時吳縣王季烈（君九）寓北京，聞訊後即於當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將二十六種書單鈔送上海張元濟。張氏檢對《楹書隅錄》，均有其書。每種開價，少者千圓，多者乃至九千圓。季烈又云：“兩孟詩（按指宋本《孟東野詩》、宋本《孟浩然詩》）均已售出。”張氏當即函請傅增湘赴津瞭解真相，並共謀保存之策。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傅氏覆書，大意謂“海源閣書到津廿六種皆得見。二孟一黃（按一黃係指宋本《類編增廣黃先生大全文集》）為李木老所得，五千圓以外。餘廿三種，讓值至七萬五千圓。葉玉虎欲糾合同志集款收之，商量結果，留十五種，還值三萬二千圓，不成；又數日再商十三種，予以三萬九千圓（連小費），亦不成，只得作罷矣。各書中惟《韋蘇州集》是明本，餘皆宋刊，然亦有元明印者”。事詳《張元濟傅增湘論書尺牘》（181—183頁）。事後獲悉，除二孟一黃為李盛鐸捷足先得（宋本《孟浩然詩集》轉歸南海潘氏寶禮堂），宋本《會稽三賦》未能出售（後為押入天津鹽業銀行九十二種之一）外，其餘二十二種，陸續為國內藏書家所有，其中北宋本《荀子》、《淮南鴻烈解》，宋本《管子》、《說苑》、宋本《康節先生擊壤集》、宋本《三謝詩》為大連圖書館所

得；宋本《新序》、宋本《南華真經》（書單上稱《莊子》）、宋本《陶淵明集》、北宋本《王摩詰文集》、宋本《皇甫、杜、岑、常詩集》（按實係四種）為周叔弢所得；宋本《愧剡錄》、宋本《楚辭集註》、宋本《山谷老人刀筆》（實係元刻）、宋本《雲莊四六餘話》、宋本《蔡端明集》、宋本《晉書詳節》為劉少山所得；宋本《孫可之文集》為莫伯驥所得；宋本《范文正公集》為潘復所得（此據佚名批注《海源閣宋元秘本書目》）；明本《韋蘇州集》為王獻唐所得，歸諸山東省立圖書館。當楊承訓捆載海源閣書在天津出售時，安國軍政府國務總理適為濟寧潘復。潘復固喜藏書，名其藏書室曰華鑑閣。清宗室盛氏（昱）書散出時所得獨多。民國七年（1918）任北洋政府靳雲鵬內閣財政部次長時曾以大洋一萬元購得宋紹興二年至三年兩浙東路茶鹽司公使庫本《資治通鑑》三百九十四卷，復以宋紹興本《白孔六帖》易得傅增湘藏宋本《通鑑目錄》三十卷，使其珠聯璧合，一時傳為書林佳話。面對楊承訓捆載海源閣宋元秘笈在天津出售，潘復出於山東鄉誼，不能熟視無睹，（當時山東省尚在奉系安國軍政府控制之下）當於民國十七年（1928）二月間致電山東省長林憲祖，阻止海源閣書繼續出售，或由本省籌款購入。張元濟於上海見報後信以為真，於致傅增湘書中嘗謂：“果爾，則楊氏閉門揖盜，殆將不可得矣。”但其時奉系政府已日暮途窮，林憲祖並未採取任何措施。同年國民黨北伐軍西北軍第十七師馬鴻逵部進駐聊城，海源閣藏書略受損失，承訓深恐“四經四史之齋”及陶南珍藏，終非吾有，其岳父勞之常更百般慫恿，承訓遂決心將宋元校鈔擇優裝十餘大箱，於是年冬乘大風雪雇長途汽車運抵禹城，然後由火車運往天津，存西安道寓所。外人固未嘗知也。惟承訓此舉，出於倉卒，加以長年不在閣中，於宋元校鈔未嘗究心，裝箱起運之際，復未暇別擇，宋元舊槧及名家鈔校、顧黃校跋之書遺諸閣內者，尚屬不鮮。民國十八年（1929）七月十日土匪王金發陷聊城，其司令部即設於海源閣內，隨帶之書記官、參謀，有蘭山樊天民，堂邑楊道南，均係前清生員，頗

知書本，將海源閣宋元秘笈，及金石書畫，擇優掠去，引起全社會人士關注，南北報章，迭有報導。時王獻唐出長山東省立圖書館，奉山東省教育廳長何思源令，前往聊城實地調查。王氏於十一月十八日抵海源閣時，但“見其書籍零落，積塵逾寸。宋本《史記》殘餘一冊，宋本《臨安志》殘餘二冊，均散置地上，與亂書相雜。字畫碑帖，僅餘軸木夾版，中心多被撕去。藏硯數十方，只存硯盒，所有硯石，亦無一幸免。楊至堂畫像一軸，撕裂如麻，投置几下。黃蕘圃手校宋本《蔡中郎集》，為海源閣刻原本，第四冊後頁，亦以拭抹鴉片煙簽，塗污滿紙。以鎮庫之珍籍，損壞如此，可為痛心！其家人並謂匪徒每以閣上書籍炊火，舊書不易燃燒，憤言誰謂宋版本書可貴。此均以毛頭紙印之，並不蒸火也”。（以上引王獻唐語）匪徒之胡作非為，令人髮指。王氏抵聊之日，即召集各界代表，組織海源閣藏書清查委員會，次日同往楊宅清理，就海源閣劫餘善本書籍，逐部點查，由王氏親自登記，其凌亂紛雜，或投置地上者，亦一一為之整理，庋排架上。盡三日之力，始行告竣。時值天寒，手足為僵。據王氏開列現存善本書目，凡宋、元、明本、校本、鈔本一百三十一種，據余核對結果，其不見於《楹書隅錄》、《海源閣書目》及《海源閣宋元秘本書目》者十六種。在一百三十一種中如北宋本《揚子法言》、宋本《童蒙訓》、宋乾道本《史記集解索隱》（殘存一冊）、宋本《咸淳臨安志》（殘）、元本《南史》、元本《北史》、元大德本《唐書》、元本《黃帝素問靈樞經集證》、元本《事文類聚翰墨大全》、元本《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元本《范德機詩集》、元本《道園學古錄》，均為海源閣精善之本，而海內外早已亡佚之元本《中菴先生劉文簡公文集》二十五卷本（《四庫全書》輯自《永樂大典》者僅有二十卷），固赫然俱在。在諸多校本中如《博雅》、《中吳紀聞》、影宋鈔本《刻錄》、校宋舊鈔本《中興館閣錄》、校宋本《列子》、校本《新序》、校宋本《揮麈前錄》、《後錄》、舊鈔本《東萊先生詩律武庫》、校本《蔡中郎文集》（海源閣覆刻之底本，為顧、黃所合校）、舊鈔本《錢考功詩集》均為

黃丕烈所手校，陸游《南唐書》為顧廣圻手錄陸敕先校本，舊鈔本《湖山外稿》為惠棟所手校。在鈔本中，如《春秋權衡》為影鈔元大德本，《雲溪友議》為明嘉靖乙未王吉庵鈔本，《楊誠齋詩集》為影宋鈔本，《默堂先生文集》為影宋鈔本，《石林奏議》為清咸豐胡心耘影宋鈔本，而被顧廣圻視為天壤間惟一孤本，足以訂正陸氏《經典釋文》踳駁錯誤，恢復廬山真面之明葉林宗影鈔文淵閣本《經典釋文》，即在其內。（說見王獻唐《海源閣藏書損失與善後處置》引黃侃鈔示顧廣圻跋。此跋不載《思適齋集》，載王大陸輯《思適齋書跋》卷一。）類似此種宋元校鈔，均屬海源閣鎮庫之寶。其價值之重要，不難想見。王氏將現存善本書目登錄完竣，復至後宅三室檢視明清版本書籍，此即楊保彝《海源閣書目》所謂普通版本，其藏弃固尚完好無損。因卷帙過繁，未暇詳細登記。王氏返濟，除向教育廳匯報外，復撰《聊城楊氏海源閣藏書之過去現在》一文（時在民國十九年二月），公諸於世。此海源閣第二次遭劫之情形也。

民國十九年（1930）年，山東省政府正在擬具善後處置辦法，付諸實施，而聊城附近，土匪蜂起，道路梗阻。既而匪徒占據聊城，盤據海源閣內。土匪去後，又有招撫改編之軍隊入城，此去彼來，陸續不斷，亦不能一一詳其姓字。但知攫書最多者，為一王冠軍而已。此為海源閣第三次遭劫，凡王獻唐登錄之書，掠奪一空，楊氏後宅三室所藏明清版本，亦部分受損。迨王冠軍部開移河北（其籍保定），即將所攫物品，運至家中保藏。王冠軍旋以染病身故，其如夫人時有存書出售，當地寶文堂（一說奎文堂）書肆，所得最多。既而北平書賈，聞訊蜂集保定，又為文友堂、文祿堂、藻玉堂所分得。其出售之書有出於王獻唐登錄之外者，如黃丕烈校跋明鈔道藏本《劉子新論》（《藏園羣書經眼錄》題《劉子註》），以大洋一千圓為傅增湘所得。至王氏登錄之宋本《童蒙訓》，則已流落德縣打尖。是年夏，北平琉璃廠崇文齋主人孫殿卿由北平返里探親，乘火車至德縣打尖，恰逢該處集市，孫殿卿偶於舊貨攤上發現宋刊《童蒙訓》兩

冊，喜出望外，即以廉值購入，旋以善價售與北平圖書館。（以上兩事，均見雷夢水《書林瑣記》）王氏登錄之元本《復古編》已流入天津某某茶肆，民國二十三年（1934）始由藻玉堂主人王子霖歸於周叔弢。（見《自莊嚴堪善本書目》附《弢翁藏書題識·復古編跋》）可見海源閣歷經第二、三次浩劫，散非一時一地，販賣奔走四出，西至保定、順德、大名，東至德州、濟南、青島，風起雲湧，竭力窮搜，萃積於平津各肆。其流入濟南市肆者，以敬古齋所得為多。該肆主人王仁竟、王笙甫父子，待善價而沽。據濟南藏書家止適齋主人王貢忱所見，即不下四五十種，大都計葉論價。其所得黃丕烈校本《孤臣泣血錄》，後歸吳興張氏，轉歸中央圖書館，現藏臺灣中央圖書館。有王貢忱跋。（見王文進《文祿堂訪書記》卷二）王獻唐所見者，亦非王氏勘查時登錄之書。據王氏自述，先後所見者凡九種：黃蕘園校《穆天子傳》，顧千里校《說文解字繫傳》，黃蕘園朱秋崖等合校《封氏聞見記》，吳枚庵手鈔、黃蕘園手校《江淮異人錄》，明本《武夷新集》，明本《許白雲集》，劉武仲兄弟合作《字冊》，黃蕘園校《林和靖集》，黃蕘園校舊鈔本《紹興十八年同年小錄》，校舊鈔本《呂衡州文集》。（按王氏自稱所見九種，如將《字冊》除外，則恰為九種）除向親朋告貸自購黃校《穆天子傳》、顧校《說文解字繫傳》兩種外，黃校《林和靖集》、黃校《紹興十八年同年小錄》、校舊鈔本《呂衡州集》以議價未成，即為北平書賈携去，後歸北平圖書館。其後王氏復得馮舒（孱守居士）鈔校本《呂衡州集》。連同黃朱合校《封氏聞見記》等四種，一併購歸山東省立圖書館。據余所知，王氏先後獲見海源閣散出之書，購歸山東省立圖書館者凡二十七種，余均已逐一在《楹書隅錄》、《海源閣宋元秘本書目》分別加注，其中未見《海源閣宋元秘本書目》著錄者十種，亦已輯入《海源閣宋元秘本書目補遺》。而傳增湘所藏宋本《咸淳臨安志》存二十二卷，其中十二卷係王獻唐見於濟南市肆代為購得，（見《藏園羣書經眼錄》）可見其對海源閣遺書之關切。王氏因購得黃校《穆天子傳》、顧校《說文解字

繫傳》，爰名其書齋為“顧黃書寮”，並賦詩以記其事。詩云：“黃金脫手了無餘，換得陶南鎮庫書。不學東家權子母，魚鹽柴米姑徐徐。”王氏於閣書之重及自得之樂，可以想見。其後於民國二十三年(1934)又將黃校《穆天子傳》影印問世，頗為學者所稱道。海源閣迭經二次浩劫，遺書星散，實為我國藏書史上絕無僅有之事，傅增湘氏所謂“萬本琳瑯，遂隨劍佩弓刀以俱去”，可謂慨乎言之。然痛惜之餘，尚有稍感欣慰者，楊氏後宅三室明清版本書籍，大體完好。劫後楊承訓返聊城故里，囑管事鄧華亭逐一清點，共裝五十餘箱，於是年十二月十四、十五兩日，運往濟南經二緯一路東興里寓所保存，《海源閣叢書》書版，則運往聊城西南田莊祖塋之旁“弘農丙舍”暫存。王獻唐聞訊，即於十二月廿九日所撰《海源閣藏書之損失與善後處置》一文中極力向楊氏呼籲，以楊氏藏書關係文化至鉅，必須妥善保存，並商得楊承訓同意，草具《楊氏海源書籍協議大綱草案》一份，徵求楊氏意見。《大綱》計分三項：一為楊氏委托山東省立圖書館保存；二為半捐半賣；三為平價收購。王氏所提三項建議，並分別擬具詳細具體措施。王氏以為“鑒往可以察來，竊嘗謂杞人之憂矣。如於將來之收藏上，無確切把握，曷若早為之計。如其轉歸異族，曷若持享國人。如其散於千百人之手，片鱗只爪，不成系統，曷若聚之一處，俾歸全用。如或散出之後，遭人指謫，曷若藏諸公家，播得美譽。孰得孰失，比較可知”。王氏又云：“楊氏先人，皆碩學通儒，萃畢生之心力，善襲而藏，所期望於後人者，為其能讀能守使書歸有用也。然天下不虞之事，無時或有。設吾前言，竟不幸而中，則累世心血，悉赴東流。趙清常一生聚書，身後散出，武康山中，白晝鬼哭三日。此雖迷信之談，不容今世，然為人子孫者，究竟於心未安也。楊氏世守先業，代有聞人，時移世遷，今非昔比，其保藏之法，似可行之於前，不能施之於後，蓋居今世而猶欲鈐諸篋衍，深封秘藏，必有大力者負之而趨，勢必不能矣。故善承先志者，必默察情勢，因時制宜而為之。一方面使利益同沾，祖德

遠揚；一方面能永遠保藏，舊業不墜。此仁人孝子之所為，尤願與楊氏商榷者也。”王氏復就藏書與讀書之關係向楊氏進言：“古人著書，為其欲人讀耳！居書藏書，亦為其欲人讀耳！著而不讀，則與著書之意背；藏而不讀，則與藏書之意背。然使個人自讀，不如多數人共讀之，曷以故？利己利他故。世間萬彙價值之評定，全在有利用與否。圖書以有用而有價值者也。然或藏之櫝笥，秘不示人，其有用之功能，無從表現，是化有用為無用，變有價值為無價值。書而有知，寧不抱屈；若書盡有靈，寧不銜恨。故善藏書者必讀書，善讀書者必能推己及人，使人人共讀之。遠不必論，清代曹倦圃之流通古籍，藝林所播為美談者也。非特外省人如此，乾嘉中葉歷城周林汲先生，創辦借書園，舉所藏書，盡貯園內，凡來借書者，無不畀之，一時人稱其便，盛譽鵲起。名賢往跡，歷歷可數，此從書籍方面而欲以先賢期諸海源閣主人者也。”王氏說之以道義，陳之以利害，動之以愛國愛家之感情，期楊承訓為曹倦圃、周林汲，為楊氏孝子仁人，為山東文化作義舉，然卒未為楊承訓所動。

楊承訓既將宋元校鈔運至天津，除於民國十六年（1927）出售二十六種外，因投資工礦事業，亟需資金，於民國二十年（1931）由藻玉堂主人王子霖介紹，復以九十二種宋元珍本押入天津鹽業銀行，得大洋八萬圓。同時零星出售，書賈出入其門，絡繹不絕，亦有藏書家登門觀書者。周叔弢於是年十月跋《樞書隅錄》、《隅錄續編》時云：“楊氏藏書散失，合余所見所知者，蓋十存八九，惟宋本《周禮》、《莊子全解》、《山海經》，北宋本《陶詩》、《二百家名賢文粹》、《花間集》，元本《梅花字字香》、《梅花百詠》、《東坡詞》、《稼軒詞》數種，不知落誰家手？殊懸念耳。”（見《弢翁藏書活動四錄·弢翁藏書題跋輯錄》）經查弢翁手批，以上十種海源閣善本書，宋本《陶靖節先生詩註》四卷《補註》一卷，於民國二十二年（1933）歸於弢翁；宋本《周禮註》十二卷，金本《壬辰重改證呂太尉經進莊子全解》十卷，宋本《山海經》十八卷，元本《梅花字字香》二卷，元本《梅

花百詠》一卷，元本《東坡樂府》二卷，元本《稼軒長短句》十二卷，均已於民國二十三年(1934)歸於弢翁；宋本《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三百卷，宋本《花間集》十卷，均於民國二十四年(1935)歸於弢翁。楊承訓於民國十六年(1927)在天津出售之二十六種，其中如北宋本《王摩詰文集》十卷、宋本《陶淵明集》十卷，亦先後於民國十九年(1930)、二十年(1931)始為弢翁所得。其他如宋本《三禮圖》，得於民國二十四年(1935)；宋本《唐求詩》，明活字本《開元天寶遺事》，得於民國二十五年(1936)；《開元天寶遺事》則為承訓所贈與者。在抗日戰爭期間，自民國二十八年至三十七年(1939—1948)，先後得宋本《毛詩》、金本《通鑑節要》(按：實係蒙古憲宗三年至五年張宅晦明軒刻本《增節標目音註精義資治通鑑》)，鈔本《蛻庵詩》，校本《邵氏聞見後錄》、校本《博雅》，校本《糖霜譜》，元本《爾雅》。(見《弢翁藏書活動四錄·弢翁藏書題識輯錄》)可見承訓散出之書，自民國十六年(1927)至解放前夕，從未間斷。其售與他人者，可以此類推。至民國十九年(1931)押入天津鹽業銀行之宋元珍本九十二種，承訓因經營失敗，到期無力贖回。時潘復辭張學良將軍東北邊防軍司令部高等顧問，定居天津，以事關國家保存文獻，復恐所得非人，將海源閣鎮庫之寶，流出海外，因商諸天津市長張廷諤及旅居平津人士常朗齋、王紹賢，組織存海學社，集資八萬圓，購存於天津鹽業銀行。所謂“存海學社”，顧名思義，意即保存海源閣藏書。但道路傳言，謂潘復等購書目的，意在售諸日本人，即傅斯年亦不例外(余曾見傅斯年與王獻唐書複印件，為王獻唐先生兒媳安可行女士提供者)。此實妄加猜度，且與事實截然相反。潘復於民國二十五年(1936)九月十三日病逝於北平西山。存海學社購存鹽業銀行之書，始終保存完好，不輕以示人，惟傅增湘於民國二十年(1931)三月十三日稅駕津沽，得以入庫觀覽，歸後撰《海源閣藏書紀略》，播諸海內，益為海內外所矚目。傅氏於海源閣書三十年來，目想神遊，形諸夢寐，此次在天津鹽業銀行庫房獲觀宋

本三十餘部，元本二十餘部，而古鈔秘校不計焉。自歎“如入瑯嬛之府，登羣玉之山，目不暇給，美不勝收，而尤使人怡神愜志者，則‘四經四史’大都赫然俱在。然後歎篋中所儲，固已探驪得珠，其散落四方者，祇一鱗片爪也，烏足同日而語耶”！是則存海學社保存之功不可沒。余於《訂補海源書目五種》後記中詳細記其事，蓋所以崇德報功，還歷史本來面目。民國三十三年，存海學社又加入新股，改名曰“存海學社新記”。民國三十四年（1945）抗戰勝利。十一月，國立北平圖書館復員，報經教育部長朱家驊批准，撥款收歸國有。時適行政院長宋子文視察平津，當即下手諭，必須妥善處理。經多方協商，決定作價國幣一千五百萬圓，收歸國有，交國立北平圖書館收藏。嗣於民國三十五年（1946）一月二十八日在天津鹽業銀行交接清楚，計宋元善本書九十二種，一千二百零七冊，分裝七大箱，於二月一日，派兵護送到平。從此流落天津長達十五年、稀如星鳳之陶南精帙，終歸國家典藏，實為我國藏書史上一大幸事。尤足稱道者，存海學社成立之初，天津市長張廷諤為主要成員之一，抗戰勝利，仍由張氏出任市長，故存海學社新記與國立北平圖書館達成協議及交接手續，均由張廷諤一手經理，“存海”初衷，得以實現，張氏與有力焉。

楊氏海源閣宋元校鈔，盡萃於《楹書隅錄》及《隅錄續編》，然紹和、保彝晚年所得之書，未嘗入錄，故保彝晚年所撰《海源閣宋元秘本書目》實集海源閣宋元校鈔之大成。《海源閣宋元秘本書目》共著宋元校鈔四百六十九種，較《隅錄》、《續編》增出二百零一種。計經部七十七，史部八十五，子部一百零八，集部一百九十九。若以版本分，計宋本一百零八，元本八十二，明本三十三，校本一百四十一，鈔本一百零四。近數年來，余於董理《海源閣書目五種》時，檢核各家書目，凡見於著錄者二百九十五種，去向不明者一百七十四種。另有近人所見而為《海源閣宋元秘本書目》失載者一百二十種。其中宋本八，元本十六，明本五十，清本一，校本八，鈔本三十

五，高麗本一，其他一。余已輯為《海源閣宋元秘本書目補遺》一卷，此一百二十種凡有近人題跋者一百一十一種，則輯為《楹書隅錄補遺》四卷。此次整理凡海源閣星散之宋元校鈔見於著錄者，粗略統計，其中直接間接歸於北京圖書館者二百六十一種（其中有三十六種於抗戰期間移存美國國會圖書館，五十年代初移存臺灣中央圖書館）。除北圖陸續零星收購外，直接購自存海學社新記者九十二種；由周叔弢轉歸北圖者五十七種；由劉少山轉歸北圖者二十種；由邢贊亨轉歸北圖者六種；歸陳澄中六種，轉歸北圖者五種；歸傅增湘七種，轉歸北圖者五種；歸莫伯驥二種，轉歸北圖者一種；由潘明訓轉歸北圖者三種；歸吳興張氏九種，轉歸北圖二種，轉歸南京中央圖書館者七種。（其中三種為張鈞衡之孫張珩所得，先歸吳興蔣氏密韻樓，轉歸臺灣中央圖書館）南京中央圖書館自購者尚有三種，故現存臺灣中央圖書館者共計四十六種。存臺灣大學圖書館者一種。此外歸大連圖書館者六種（1945年大連解放後佚失）；歸張允亮、張子厚、謝國楨者各一種；歸王獻唐二種，歸山東省圖書館（現存山東省博物館）者二十七種；由齊魯大學轉歸山東省圖書館者一種；歸南京圖書館、美國國會圖書館者各一種。因囿於見聞，其未及知見者，為數尚多。惟海源閣宋元校鈔流散之梗概，於此可以窺其崖略。

海源閣劫餘之明清版本書籍，原藏濟南經二緯一路東興里，楊承訓既拒絕王獻唐之三項建議，故存放該處歷有年所。民國三十年（1941），東興里房屋出售，承訓又將其運往北平宣武門內親戚家中，勞之常一再威脇利誘，欲承訓以三百萬圓聯合儲備銀行偽鈔售與日本人，以謀求出任偽山東省長，承訓嚴詞拒絕。嗣後濟南人士辛鑄九、苗蘭亭、張蔚齋等集資三百萬圓，幾經磋商，由辛鑄九與勞之常達成協議，購藏濟南麟祥街道德總社。民國三十四年（1945）抗日戰爭勝利，山東省政府復員，省主席何思源抵濟。山東省政府政務廳長劉道元對保存齊魯文獻極為重視，劉氏首先倡議將移藏道德總社